

刘心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心态转变探析

杨文静
(鲁中职业学院 山东 滨州 256200)

摘要: 刘心武 1980 至 1990 年代创作心态由启蒙心态转向泛人文心态, 文学启蒙实践由“他者启蒙”转向“自我启蒙”。政治代言的寻租转向、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激化了启蒙理念与启蒙实践之间的矛盾, 进而制约了启蒙活动的展开。文学启蒙的隐性策略和作家素质的提升是社会现代进程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刘心武; 启蒙心态; 启蒙悖谬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2009)02-0036-04

一、前 言

综观刘心武 1977 至 1993 年的代表作品《大眼猫》、《钟鼓楼》、《私人照相簿》、《风过耳》等, 可以看出: 他的文学价值观由“为人民”转向为“终极追求”, 关注对象由社会政治问题转向人性人情, 文类由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 创作题材发生了“国—民—家—己”的变化。在此过程中, 他的写作视角逐步收缩; 知识分子在文本人物结构中, 作为启蒙者的地位发生了“高一中—低”变化。而刘心武自身在文坛的地位由“中心”趋向“边缘”, 创作心态也由启蒙心态转向泛人文心态, 具体表现为“高蹈与俯瞰—下潜与外探—内寻与上溯—审他与省己”。

创作心态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由思想背景、心理结构决定的, 在特定关注焦点下表现出的混杂潜意识理性判断和情感倾向的心理状态。启蒙心态指在文学功用观指导下, 作家希冀以文学创作表达启蒙思想的创作心态。启蒙, 英文 Enlightenment 有“照亮”之意。中国学术界中较权威的关于“启蒙”的释义多达五种, “文学启蒙”释义则多达七种。20 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启蒙”内涵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 主要来自 18 世纪的英法启蒙运动, 理性、平等、自由、博爱等都是其中的内涵因素。在对启蒙的论述中, 康德的观点广为人知: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 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把理性的运用分为“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Gelehrer] 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的“公共使用”与“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的“私人的运用”。而“理性的公共使用”则是达到“成熟”的必由之径。在对与“启蒙”相对的“不成熟”状态的生成原因, 康德至少分析到了三个因子: 别人的引导、个体

理智的有无和运用的勇气与决心。这其实指出了获致启蒙的两条路径: 借助他力和自我生发。前者可称为“他者启蒙”, 后者可称为“自我启蒙”。“自我启蒙”一个层面指作为精神个体的人的情感与理智的自我完善, 即福柯所言“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 另一层面, 在启蒙实践双主体在场的情境中, “一切先进的思想、学说, 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家、理论家的启蒙设计和思想观念之中, 而是要让它变为推动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动力, 这就不需要让被启蒙者们从思想上和情感上认识它, 了解它, 接受它, 更为重要的是由被动转为主动, 成为一种‘自觉’或‘自动’的物质性的强大力量。这就是自我启蒙。”第二个层面的“自我启蒙”可看作启蒙者进行“他者启蒙”的一种策略。

启蒙心态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研究者杜维明那里称为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指与现代形态物质文明与价值观念相关的“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 是特定哲学社会学范畴。勃兰克斯说: “文学史,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这是就文学创作意义来讲的。这种启蒙心态首先是个体对群体命运的情感焦虑和智力谋划, 是“一对多”式责任感的外现; 其次, 启蒙者以布道说服的精英姿态与被启蒙的大众之间形成了位差感。责任感与位差感是启蒙心态的主要情感表征。

人文心态是指在人文精神推动下的创作心态。“人文”较早见于中国文化典籍《周易》的《贲·彖辞》“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最初含义为创造和使用人类文明成果的生活状态中的文化风貌。人文精神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 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和进步、人与自然的同一等”, 对人类生存的物质性、基本正当人性和精神生活状况给予理解、关切、引导的价值追求。启蒙心态是人文心态的一种, “泛人文心态”则表明了其人文精神内涵已脱离了启蒙的“纯粹”色彩, 但在关注对象和情感判断上仍有鲜明的人文指向。刘心武的创作心态, 可概括为 1983 至

收稿日期: 2009-01-18
作者简介: 杨文静, 女, 山东济宁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1985年间的宽容心态、1986至1990年的沟通心态和1990年代初的自律心态。

刘心武1980年代前期启蒙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弱化、消失和被启蒙青年主体力量的增强表明被启蒙者形象由“他者启蒙”转向第二个层面的“自我启蒙”；而刘心武在1980至1990年代启蒙心态向泛人文心态的转变则表明他的启蒙思想由“他者启蒙”转向第一个层面的“自我启蒙”。刘心武在前期启蒙著作中着重表达自身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见解，而忽视了文本的自足和读者的心理感受。在后期的反思中，他把不同时期文本组织形式归于个人和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历史因素”而言，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与启蒙活动的互动关系而造成启蒙活动内在悖谬关系上探究这种转变的客观原因。

二、政治代言的寻租转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从“左翼文学”的“救亡”便开始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传统的偏离。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以抗战的需求开始了政治对文学的“异化”进程，并在建国后以“解放区文艺”的权威形态主宰了十七年以至文革的文艺生态格局。《班主任》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在于暗合了当时潜在的政治话语需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意蕴的语言符号组织，其中既有社会性因素，又有个人性因素。把它仅仅作为政治信息传达媒介，则忽视了它的人性呈现属性。十七年以至文革文学的创作规范延续了革命乌托邦的红色叙事，人性人情成为革命、改革等宏大时代主题的附庸，并一度成为文学表现的禁区。

然而，政治对文学的宰制与文学的符号特征有内在矛盾。文学是一种语言符号组织形态。对于符号的特性，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符号是任意的，“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他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形态，也由所指、能指两部分组成。只有反映人们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真实和需求的文学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对两种世界的呈现和表现都需要文字符号的准确传达。政治对文学的宰制导致文学的工具化，从而衍生文本的物性，也造成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最终造成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歧。“文革”象征物“大字报”炮制方式的荒诞、语词运作的僵化、打击目标的冲动化都表现出工具理性甚或非理性的特征。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谈到：“语言自身中已有腐朽的东西……农民对城市居民及其对语言的控制的不信任是部分正当的”，虽是针对犹太人对语言工具化产生警觉的论断，也适用于解释文学极端工具化的情形。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缺陷的根源在于权力与艺术之间的矛盾。艺术的最高灵魂是实现精神自由，而权力正是规范的集中形态。权力追求令出行随、平整划一，艺术追求标新立异、丰富多样。艺术切近人的灵魂，体现个人尊严与智慧；权力着眼于等级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并要求个人利益在适当情形

下的无条件牺牲。正是政治与文学根源上的差异在“文革”时期的愈演愈烈才造成了“伤痕文学”的“反抗绝望”。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知识阶层与新型政治话语的一次“共谋”，但毕竟发出了长期处于极左文艺政策打击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内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启蒙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借助文学的政治代言平台得以传播的。启蒙作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念实践，它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立人”，即“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另一方面要“立国”，即“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由于呈现在文本中的启蒙话语包含群体诉求，与政治话语产生交叉，两种话语在“文革”末期由于斗争对象的一致产生交响。启蒙心态的位差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文学的政治代言地位造成的。

然而，启蒙立足于个人素质的全面实现，政治则注重群体利益的共谐达成。启蒙是个人本位话语实践，而政治运用群体本位话语。刘心武在早期启蒙作品中沿用的是政治话语表述方式并在1982年的短篇小说《黑墙》中对之进行了反思，表现出了作者话语本位的转向。随着思想控制的松动，在新文学传统复归和外来文艺观念的启发下，“当代文学”在“脱离‘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和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复苏和确立了审美核心属性和人学主体性尊严，甚至不惜以形式“无主题变奏”的矫枉过正拒绝意蕴的“超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锋小说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纯文学’诉求的完成，也意味着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的互动关联的纽带被成功地剪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大众传媒代替文学成为政治话语主要传达工具，而成为多元文化力量之一的主流文学由于时代主题的转变也减少了“启蒙”内涵的呈现。

除了文学启蒙思潮，1980年代启蒙氛围的营造还体现在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民间文化团体的兴盛上。延续“天安门诗歌”的传统，长期受到文革专制文艺政策和极“左”路线压制的民众在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畅所欲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以思想领袖、杂志和群体作为核心，以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作为基础，造就了80年代空前活跃的公共文化生活，并形成了一个有公共讨论话题、共同知识背景和密切交往网络的统一文化场域。”由此，经受了“政治启蒙”与“人性启蒙”的公众在“他者启蒙”和“自我启蒙”的交互作用中，理性思维能力得到了开掘和锻炼。

政治代言的寻租转向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多元涌现提供了宽松的人文环境，也有利于作家对创作采取更加平和的心态。刘心武在1980年代中期入党，并曾担任官方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一定程度上是主流文学作家。他与国家意识形态总体氛围保持一致，泛人文心态转向与此有一定关系。

三、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

我国 1980 至 1990 年代经济发展呈周期性特点。“1981 年起 GDP 增长速度逐步加快, 1981 年增长 5.2%, 为最低点, 然后上升到 1984、1985 年为最高点: 分别比上年增长 15.2%、13.5%, 然后平稳下滑到 1988 年的 11.3%, 到 1989、1990 年跌至最低点: 仅比上年增长 4.1% 与 3.8%。1991 年起又上行, 到 1992~1994 年间到最高点: 分别比上年增长 14.2%、13.5% 和 12.6%”, 1980 年代中期和 1990 年代初经济的高速发展寓示着社会中商品交换法则的通行。商品交换作为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能量流动方式, 人们在其中只有尽量坚持对等原则, 才能做到社会公平, 从而才能使整个经济体制进入良性运作状态。虽然在 1980 年代我国工业经济主体仍是计划经济体制, 但农村已经实现责任承包制, 个体经济也获得了正当的地位。人们的商品消费活动增多, 市场意识相应强化。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要求采用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形态。人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悖并行的形态下产生价值观念的冲突心理和偏移倾向在刘心武的《登丽美》、《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小说中都有所表现。1980 至 1990 年代是一个由政治中心逐步转至经济中心的历史过程。在同时期许多作家笔下, 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炜的《柏慧》、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作品也都有所反映。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经济意识与乡土情谊、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 在农与商、利与情、公平与效率的观念冲突中, 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是自我利益的最大获取。这对人们思维理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在商品交换中产生了平等交易的心理需求, 进而引发个人意识的重视。而利益交换主体的“趋利”倾向又会使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形成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商品经济的个人本位交易法则, 可以在生活细节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钟鼓楼》中的新娘就以雷达金表作为婆家对她重视与否的标准。

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意识。前此“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下, 文学作品作为国家政策的图解形式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社会中通行的是宏大话语载体的主流文学。而在 1980 年代, 文艺政策转向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 随后又提出了“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原则, 文艺现象和社会思潮都呈现出蓬勃活跃、多元竞进的态势。经济改革对科技、能力、效率的重视, 高考的恢复都使人们燃起了对知识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美学热”, 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成为畅销书。刘心武的《日程紧迫》中刻画了政务型与业务型两种干部的冲突,《行路难》传达出坚定改革的时代气息,《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则展现了注重学习新知的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消费需求的增长, 港台剧的风行,《渴望》感动中国, 出国热带动人们对外语的重视, 文化产

业应时而生并渐具规模。刘心武曾在剧本中写到 1985、1988 和 1992 年人们分别对作家、英语辅导老师和公司经理的追捧, 展现了时代主潮的变动讯息。在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中, 人们破除了与文化产品的紧张关系。自 1980 年代前期起, 接受美学思潮就对读者的主体身份进行刷新确认; 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的论述把作家和读者的主体性都加以强调。这些都促使社会思潮把精神产品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间的位差感加以淡化。1990 年代初期“躲避崇高”的解构思潮风行大陆, 刘心武的《风过耳》刻画了以利相求的知识分子形象。商品经济交换规律的潜移默化, 精神领域的一元规约性放松, 社会集体心理的个体意识和平等意识都增强了。在时代的斗转星移中, 积极入世的刘心武创作心态中的位差感逐渐削平。

四、启蒙活动悖谬关系的制约作用

启蒙作为现代理念传播活动, 是“一个两百年来以各种形式重复的问题”。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霍克海默、福柯、哈贝马斯等哲学家都对此有相关论述。随着现代民主政治体系的完善和工业文明的发展, 人们对启蒙的认识也在同步更新, 着眼于现实弊端和改进启蒙的愿望, 对启蒙的反思主要集中于价值目标、理念内容和主体结构等方面, 有批判技术主义偏致的“反启蒙”, 也有检讨启蒙意愿与文本表现矛盾的“负启蒙”。或破或立, 其实质是共同勘探启蒙活动与人类生活相谐共生的极限边界。启蒙活动就构成主体来讲是精英对大众的权威话语行为, 主体之一是被马克思称为“精神生产者”的知识分子, 往往指“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并在人格上达到自我觉醒, 以求知为目的, 不断创造、传播、使用文化, 忧国忧民, 对社会发展极具责任心, 对现实社会, 不断加以批判, 以自己作为社会的良心和评判社会事物进步或退步的标准”的一类人。知识分子对大众具有启蒙理念优先获得的微观“话语霸权”。然而启蒙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又与其倡导的现代理念有着根本的冲突。启蒙活动自身的悖谬关系即产生于此。

18 世纪启蒙哲学根源于自然法则的“理性”意识。“启蒙哲学认为, 自然和认识都应置于它们自身的基础上, 按它们自身的条件加以说明”, “自在”为“自为”立法, 奠定个体欲求与思维权利的正当性。这对个人来讲, 意味着情感需求、理智运用与精神领域神权下的解放与个体规划自由的获取; 对个人与他人关系来讲, 是主体地位对等思维下对他人权益的尊重与宽容。因此, “理性”与“平等”便组成了启蒙主体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界定起点, 也成为启蒙内涵的根基, 由此衍生出发掘自我的“自由”、“个体”与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博爱”、“多元”等思想理念。在启蒙开创的现代社会进程中观察启蒙理念在启蒙实践与其他社会结构因素的互动中产生的接受效应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对启蒙内在规律的了解。

就“理性”观念讲, 18 世纪启蒙哲学中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 最重要的功用是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分解之后就

开始建设”。福柯曾指出“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的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裁定“给予一切被作为‘存在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的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胡塞尔）的理性在启蒙中的核心地位。理性作为“万物的尺度”可用来评判一切事物或活动，包括启蒙本身。当启蒙同时作为实践和思想观念自反地作为理性观照的对象时，甚或理性观照“理性”时，启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判断标准成为问题。一方面，这是一个陷入无限恶性循环圈套的悖论；另一方面，启蒙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具有人文知识“不是现代知识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者用当下的技术语言来说‘可编码化的知识’，而是一种最切近人类自身生活经验的学问或生活智慧。”的特性，其中的不确定性解构了其存在的必然性与接受的充足律。这种内在龃龉与自我消解使其失去传播中的权威面目，从内涵到实践流为充满变数的见仁见智。人类思想史上众语纷纭话启蒙的现象未始不与此有关，而在理性群情高昂的1980年代，刘心武的宽容态度更多是出于对客观现实的接受和“妥协”。

就“平等”观念而言，西方经典意义上把它作为一种人类天然能力的保障。在伏尔泰编写的《哲学辞典》中，“平等”被规定为：“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平等即“就权力而言，则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这些思想先觉者捍卫的是个体自然性的起点一致及在社会中的最大公平，这也是我国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启蒙者对封建特权、特权的揭露和阶级差距的抨击的平等理念来源。“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在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的启蒙过程中，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位差现实逐渐遭受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在“运用理智”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教谕口吻是对民众理智能力的导向干涉，其向民众大张旗鼓对“平等”的倡导就造成对平等理念曲解的印象。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观念，在理论上是反权威的。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与别人平等，所以应有权利为自己的事做决定的时候，他常会以为自己也有能力为自己的事做决定。这种混淆是思想与文化进展的阻力。”但这种混淆在“商品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原则把人们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确立了一种人与人平等的格局”的社会现实中极易被忽略，并在大量民众那里成为事实风险。这种“非启蒙”文学思潮“不仅不是对启蒙文学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是后者自身发展的结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正是个人解放、自我实现的表现”。刘心武的困惑和变通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源于此。

1980至1990年代，刘心武的启蒙文学人物形象和文学启蒙活动发生了由“他者启蒙”向“自我启蒙”的双重转向。

这种转变缘于时代环境引起的自身文学观念和启蒙思想成熟和深化，也呈现了启蒙活动内在在悖谬关系的制约作用。这从反面确证了随着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公共领域的形成和边界的扩大，人们对活跃其中的知识分子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本着对个体理性的认可和他人权利的尊重精神，启蒙隐性策略的选择是必然的。而基于对文学审美自足核心属性的确认，在文学启蒙中采取隐性策略则是必须的。由启蒙文学向人文关怀写作之间的血脉关联却因时代转换而清晰。

参考文献：

- [1] 杨文静. “合”与“和”的追求——试论1980年代中期刘心武的创作[J]. 语文学刊, 2007(7): 70—75
- [2] 金 华. 文学启蒙的概念界定[J]. 重庆社会科学, 2004(1): 40—42
- [3] (美)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 徐向东, 卢华萍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4] 刘心武. 小说语言问题之浅见[J]. 当代文坛, 1982(6): 10—12
- [5] 张光芝. 启蒙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 [6] (美)杜准明. 超越启蒙心态[J]. 雷洪务, 张 珉译. 哲学动态, 2001(2): 48—54
- [7] 杜毓生. 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化[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8]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现代语言学教程[M].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马 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M]. 单世联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0] 董 健, 丁 帆, 王彬彬.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1] 贺桂梅. 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J]. 文艺研究, 2005(10): 13—20
- [12] 许纪霖.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J].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3] 俞忠英. 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分析[J]. 探索与争鸣, 2004
- [14] 米歇尔·福柯. 什么是启蒙?[A]. 汪 晖, 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15] 王岳川. 后现代知识转型与知识分子危机[J]. 学术月刊, 1994(2): 24—27
- [16] (德)E·卡西勒. 启蒙哲学[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17] 万俊人. 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J]. 读书, 2004(4): 99—108
- [18] (法)卢 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9] 林毓生. 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A]. 五四: 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20] 陈载弼. 商品经济与文艺发展[J]. 理论学刊, 1995(1): 89—92
- [21] 张光芒.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责任编辑: 马小军